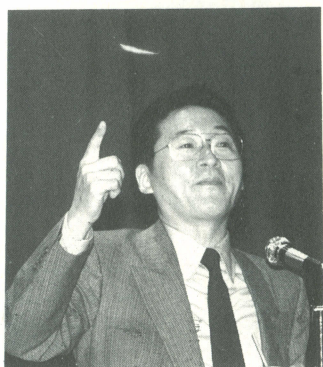


中



西

文化論戰

演講：李敖
整理：金妮

主辦單位：北青社、藥學會
時間：七十八年五月四日
地點：杏春樓

今天要談的題目——「中西文化論戰」，在講之前，我想先談談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？

從一九一二年，也就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，在中國社會裡，有過好多次所謂的「論戰」最早時，有孔教論戰——爲了孔子儒教

到底是不是國教而爭；再來有國體論戰、科學與玄學論戰、中國社會史論戰、民治與獨裁論戰等等；到台灣後有中西文化論戰。在這麼多論戰裡，我們發覺，中國正遭遇到一個問題——什麼才是我們真正的方向？

讓我們回想，在七十年前今天發生的「五四運動」，最近大家最熱門談的，為什麼在七十年後，還引起我們這樣大的注意？

「五四運動」當時所爭取的，是所謂的德先生——民主、賽先生——科學。嚴格說來，這個爭取發生問題、有了故障，舉例看

：當時有一份「新青年」，由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——陳獨秀發起的；他首先提出，我們要有德先生、賽先生，即提倡民主、科學。陳獨秀當時給民主下了一個方向，他說：「我們要追求那一種民主呢？要追求英美的，以英國美國式的民主爲榜樣。」可是很快的，在「五四運動」發生後，大家所追求的方向轉變，變成蘇聯式的了。

到了民國八年國民黨成立，民國十年共產黨成立。當共產黨成立後，我們就勾結了一個外國力量，這力量就是蘇聯的力量。我們回想民國初年，孫中山革命成功後，把總統讓給袁世凱，因當時政府的勢力，在北洋勢力裡，是屬袁世凱的勢力最大。可是孫中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，他對推翻滿清有功勞，但對建立民國有罪過。這話怎麼講呢？

民國建立後，孫中山不太甘心把這個革命的果實，讓給北方、讓給了北洋勢力，所以他一直想搶回來。用什麼方法搶回來呢？就用我們現在所謂的「叛亂團體」這辦法，他在南方成立一個政權，這個政權不是國際所承認的政權，也不是那個原先被他讓給北方的政權，而是一個非法的，我們所謂的「叛亂團體」。而在成立這叛亂團體前，孫中山想聯合美國，美國不理他；找英國，英國不理他；找日本，日本不理他；找德國，德國不理他……最後他派一個人去蘇聯接洽，派誰呢？就是民族救星——蔣介石。他們和蘇聯勾結，由蘇聯提供金錢、武器、提供顧問、教官，他們在南方成立一個革命政權。

但蘇聯當局有附加條件，他們也要支持共產黨，怎麼辦呢？孫中山就說好，把共產黨收過來，讓他們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，即所謂的聯俄容共；就這樣，你們蘇聯給我們錢，我們把你們的黨員收為國有，大家就像兄弟一樣嘛。所以在國共密切的合作之下，向外又勾結有外國勢力，就開始我們所謂的北伐了。

什麼是「北伐」？就是他們這非法團體，靠外國人的力量，用外國人的槍炮、子彈、顧問等，來搶奪國家政權。到了一九二八年，這搶奪勉強成功，即所謂的北伐成功、中國統一了，他們才得到了政權。

現回來看，在和蘇聯合作時，國民黨忽然發現，他們要組織一個黨，一個蘇聯式的政黨，有類似那些中央委員、黨魁、主義：等等全套的，和共產黨的組織是一樣，這可不是英美式的了。在「五四」後，我們雖口頭說要民主與科學，事實上，卻走錯路了。陳獨秀說：「唯物史觀是科學」，他把唯物史觀當科學，而實際上應是玄學。但當時他們搞不清，將其視為科學；又將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，視為民主。

記得十多年前，胡適和我談過，他說很懊惱，懊惱什麼？懊惱他們由一九一七年開始，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運動、新文化運動。他們當時是想以思想的力量來改造中國，使中國人聰明，變得有頭腦、有思想，可是結果呢？五四運動發生後，大家無法冷靜的從思想上，去做一個明智的中國人，而全部投

入政治，變成了政治活動。他認為五四運動對於新文化運動而言，是一條錯路。

大家看文章有時要注意，如梁實秋有一篇文章說到：五四運動以後，發生新文化運動。這是錯的，事實上，新文化運動發生二年後，才造成了五四運動。五四運動當時的意思是，我們要救國，大家來不及去研究思想、來不及去搞新文化了，要拼命救國，所以國民黨也好，共產黨也罷，大家紛紛投入這政治鬥爭的旋渦裡去了。一直搞到今天，可是中國又如何呢？我們現在「五四」這天回想，我的看法和別人不太一樣，我覺得「五四」對中國、對一個明智的中國而言，是一個錯路，至少是一條叉路，偏離目的了。

我們再向前回想，為什麼發生中西文化的論戰？在中國人原始的想法裡，我們中國是華夏、是中央、是我獨尊的，不需要和夷狄糾纏不清。可是一八四〇——一八四二年，發生了鴉片戰爭，當時那些真正看到外國槍炮比中國強的人，林則徐最先認清，他請一個朋友——魏源，編了一部「海國圖志」，他就研究，研究外國為何比中國強。在鴉片戰爭後，他曾偷偷寫了一封信給朋友，信中說，現在真不得了，外國有個大炮。我們中國人作戰，一向是我看到你，你看到我地打，但現在外國人有大炮，我們連對方是什麼樣子都還沒看到，就被他們打死了。他覺得這大炮太恐怖了，而感到非常憂慮，但他不敢公開表示，只是私底下和朋友表示。

在林則徐之後過了二十年，太平軍起，

我們所說的太平天國之亂，當時有名的人，如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等。胡林翼和左宗棠同歲，但他四十九歲就死了。而左宗棠活到七十三歲。當時胡林翼打太平軍，在安慶大勝，正籌備滿志。一天看到長江上，有兩條洋船——就是外國人的輪船，逆江而上。他看後一言不發，急急策馬而回，回來後吐血，後來生病，沒多久就死掉了。在他死前，旁人問他，為什麼看見外國洋船就嚇成這樣？他回答，太平軍好打，這種洋船就麻煩了，問題在於怎麼跟他們打。旁人又問他，如何解決這問題，他說：「此非吾輩所知也。」這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問題。他看到這問題的出現，卻不能解決。

當時和胡林翼同時代的朋友，如比他大一歲的曾國藩、和他同歲的左宗棠，他們比胡林翼晚死，必需面對這個問題。曾國藩找了很多懂中國古代數學的知識分子，找了一些鐵匠、木匠，集合起來，造了一條輪船，船造出了，卻不能開。左宗棠也用同樣的辦法，也同樣造了不能開。不能開，怎麼辦？這時他們才有覺悟，知道一定要找外國人才行。而這個覺悟，是得自清朝一個很重要的人物——恭親王，名畫家溥心儀的祖父，咸豐皇帝的弟弟。恭親王是很頑固的一個人，很厭惡外國人的，可是在英法聯軍後，他代表皇帝在北京和外國人談判，負責料理善後時，發生這些金髮碧眼的外國人，不是普通的蠻族，他們非常講信義；當時英法聯軍佔領北京，在雙方談判好後，說撤軍就撤軍

很有紀律，很守信用。恭親王在接觸外國人後改變了，認為我們要學外國人的長處，所以開始學，即我們歷史上所謂的「新政」，蓋了許多造船廠等許多廠、局，又派了許多留學生出去學。

當時清朝還出了一個有名的人——張之洞，他提出一個構想：他認為我們學外國人這些東西，還不夠的，還要有八個字，來維持我們中國的本位文化。這八個字就是——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，就是說「我們中國自身的文化，是我們的根本；而我們學西方的這些東西，是為使我們富國強兵，基本上的這些骨架，還是靠我們的中國文化。這話使大家很開心，認為我們雖學這些西夷之長，但基本上仍是我們的中國文化。這觀念一直流傳下來，流傳多久？一直流傳到今天。這話怎麼說？到今天為止，中國人還相信，我們可以選擇西方文化的優點，保留中國文化的優點，把兩種優點結合，變成一種新文化。這想法好不好？好！非常好！可是這想法行得通行不通？不知道！大家沒有想過，一個好的想法，可能是行不通的。我們想想哥倫布，他當年發現美洲，發現了新大陸，也發現了許多新物產，可是他也帶了一種病回到歐洲，那就是梅毒。我們無法在一種新文化，只要好的而不要壞的，這是無法抵抗、無從選擇的。

另舉個例子，文化的變化不是我們所能硬性規定的。在五百多年前，英國的外科醫生和某種職業混合在一起的，哪一行？是理

髮的理髮匠。那時候的外科醫生就是理髮匠，理髮匠就是外科醫生，兩者是不分開的。

到了四百八十年前，亨利八世登基後，他開始改革，開始有了差別待遇，他說外科醫生不可以再給別人理髮了，也不可以刮臉等，但理髮匠除理髮外，還可以兼營外科醫生的業務，如放血，看現在理髮店外的圓柱形招牌，裡面旋轉著像法國國旗的圖案，那就代表當年理髮匠替人放血的繃帶。看外科醫生和理髮匠至今的演變，可知文化是慢慢的轉變，不是我們能強求的。同樣的，中國有一個很好的想法——我們要吸收外國的長處，而不要外國的短處；保留中國的長處，而不要中國的短處。這個想法是行不通的，我們看共產主義的理想，殷海光老師曾和我談過，他說：

「李敖啊！我真不願意談共產主義，一談到它的理想，我打不倒它，實在太美了，大家各盡所能、各取所需，這是人類很高尚的一種情操，很好的理想，一點錯都沒有，這理想很高的。」

我跟殷老師講，這種理想中國也有啊！他叫我說說看，我就說，大同篇裡有一句話：『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諸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。』其中這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」，不就是共產主義的各盡所能？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諸己」，不就是各取所需嗎？

這種「各盡所能、各取所需」的觀念，我們喊了多久？由禮運大同起，喊了二千多

年到現在，還是行不通，為什麼？一個好的理想，事實上往往是行不通的。

理想雖行不通，但已足以使別人為它拋頭顱、灑熱血，很多人甘願為它犧牲。像最近，我們死掉的一個朋友——鄭南榕。他在大學時代，就曾來找我，我也曾和他談「台灣獨」——是一個非常好的理想，在台灣一個小地方，大家來搞獨立，不要被大陸那些窮親戚所連累了，大家有錢自己花，這樣很不錯吧？（哈哈！）可是，我們有一個先決條件，就是要在沒有中共的情況下。有一個中共在那邊，怎麼解決？他認為他是你的宗主國，你是他的一省，他就不放掉你，你怎麼辦？

鄭南榕對我說：『李先生，中共不會打台灣的，他們沒有能力打台灣啊！』

我告訴他，他太不了解中共了。中共當年發展原子彈，全中國上下一窮二白，那時和蘇聯合作，民間盛傳一個笑話——毛澤東打電報向蘇聯請求援助：『請支援糧食，我們餓得沒飯吃了。』蘇聯頭子赫魯雪夫回了一通電報：『沒飯吃，請勒緊褲帶！』毛澤東又打一通電報去：『請支援褲帶，我們窮得連褲帶都沒有。』

當中共搞原子彈時，日本有記者問他們：『你們人民窮得連褲帶都沒得穿，為什麼還要發展核子彈？』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，講了一句很有名的狠話：『我們寧可不穿褲子，也要有核子。』中共就是要核子彈，其它都不管了。

我問鄭南榕，你曉得中共的這種心態嗎？美國當年判斷中共不會打韓戰，美國的司令——麥克阿瑟將軍，堅決的說，中共決不會參與韓戰；結果，中共的部隊打進來了，傷亡慘重，死了多少人？一百萬！但死了一百萬人後，中共還是說：「打！」他們就是要打這場仗。美國又說中共不會支援越戰；中國窮成那樣，還是支援越戰，投入多少？一百八十億美金！他們就是要支援越戰。

我說，南榕啊！你不了解中共，中共有他理想性的性格，這理想的性格一但發作時，是無法收捨的。鄭南榕自己也是如此，他有理想性的性格，當理想發作時，他會為理想死去。

有這種理想性格的人，現在還有沒有呢？我說，現在沒有了。台灣世新的一位教授王曉波，他的媽媽是怎樣的一個人？是一個很漂亮的共產黨。他父親是一個憲兵團的團長，他母親嫁給他父親，爲了要套取情報；一個漂亮的女孩子，犧牲了青春，犧牲了肉皮，嫁給敵人，目的是爲了替自己的黨工作。到了台灣後，被發現，判刑槍斃了。這只是一個例子，過去在大陸上，有千千萬萬這樣的人，千千萬萬爲理想而犧牲的人；但這種人，在四十多年來，台灣國民黨的教育下，我不敢講，沒有了！最後一個是鄭南榕。

我們再回來想，很多很好的理想，是我們無法實行的。中共問題如何解決？中共問題不解決，談「台獨」就是空話。國民黨常說中共「暴政必亡」，各位小朋友，歷史上

暴政從來沒有自己亡的！（全場鼓掌！）二次大戰末期，希特勒打了敗仗，首都柏林被圍，兵臨城下，但一直到他自殺的前一天，他所下達的命令，依舊有效、準確的執行，這暴政並不因打了敗仗而滅亡。所以，這種情形要如何解決？如果不能解決，我們只得承認，一個好的理想沒有實踐的可能性。

當初我曾提出一個構想，既然台灣獨立沒有它實踐的可能性，何不換個方式？我們可以做一個更英雄式的人物，來處理這問題。話說在地中海上，有一個相當台灣四分之一大的小島——科西嘉，科西嘉原本是屬於大陸上，一個叫熱那亞共和國的，所統治著。科西嘉島上的人，不贊成，他們說：「我們要搞『科獨』——科西嘉獨立，怎麼可以讓你們大陸人統治呢？」就紛紛起來反抗，熱那亞共和國控制不住了，就想：「好啊！你搞獨立，老子打不過你，那就把你賣掉。」於是，科西嘉就被賣給法國了。法國更強大，很快就鎮壓住「科獨」了。在「科獨」中有一對夫婦，都是「科獨」運動中的英雄，獨立失敗後，懷孕的太太在逃亡中，生下一個小男孩，這個小孩子，就是日後有名的拿破崙。

拿破崙年輕時在法國讀軍校，滿腦子的獨立思想，一心一意要搞「科獨」。回到科西嘉後搞獨立運動，獨立運動還是沒成功，但卻帶給拿破崙一次覺悟，他覺悟到，「科獨」並不能帶給科西嘉真正的獨立。可是他的意見不見諒於其它同志，他舉家逃到叢林

，遙見他家被同志燒掉。他跟母親說：「科獨是不可能的，這不是我的戰場，媽媽跟我一起走吧！」他母親回答他：「我是『科獨』分子，離開科西嘉對我十分痛苦，但爲了你，媽媽願意跟你到天涯海角。」於是，他們跑去大陸——法國了。

十多年後，拿破崙不但做了法國的統治者，並且統治了大半個歐洲。我常用這個故事來勉勵台灣人，大陸你也可以統治的，你可以做拿破崙，不要洩氣，想躲開大陸，不要那麼悲觀，我們還是有機會的，尤其是在台灣獨立不可能時。

話說回來，很多很好的構想，可能是空的，無法實現，但可以換一個方向來看。我們說，吸取西方文化的長處，保留中國文化的長處，以中學爲體、西學爲用，綜合兩文化的優點，可不可能？失敗了！爲何失敗？在五卅時代，證明它是失敗的。從清朝的自強活動，人家有槍，我學槍，人家有炮，我也學炮，學槍堅炮利，但在船堅炮利之後，那種富國強兵的思想制度，中國沒有學到。

在明朝時，日本人只是中國人眼中的倭寇、海盜；在甲午戰爭時，中國海軍是世界第八位，而日本是第十一位，可是，日本把中國打垮了，這證明，不是船堅炮利，不完全是武器的問題了，其中還有其它的條件、因素，是中國人沒有學到的。

很多中國人說：「這部分我們不要學，因爲中學爲體嘛！」想想這問題，我們都知道，文化不是製造出來的，政治制度也不是

能隨便製造的，這讓我想起孫中山——發明三民主義的人。我們現拿憲法來看，一開始是說，中華民國是根據三民主義、國父遺教所組成的，但若仔細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核對，你知道有多少不同嗎？我告訴你，有百分之八十是打了孫中山的耳光，完全不合遺教。例如：孫中山說要五院制，可是中華民國憲法裡的規定，卻等於是內閣制；孫中山說：「立法委員是官吏」，可是中華民國憲法裡說：「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」。我們為什麼打著孫中山的名號，卻不實行他的遺教？因為，他的遺教不能實行，為什麼不能實行？因為他老先生在閉門造車，是他想像出來的。譬如民生主義裡說：「漲價歸公」，試問，那跌價歸誰？他的想法裡，土地不會跌價的，怎麼可能呢？你若在我家前面蓋個天橋，我家土地就會跌價，所以這制度是不通的。

另外，許多弊病是因想法的錯誤。好比說孟德斯鳩，他研究英國政治制度，發表「三權分立」。可是，他的看法是錯誤的，他錯認為英國是三權分立，實際上，英國是內閣獨裁，國會獨裁。

他的理論錯誤，影響了別人。影響美國，美國是跟著孟德斯鳩的思想走的，而美國經過長達一、兩百年的試驗，它找出一套適合它的制度。但三民主義不是，它沒經過試驗，只是孫中山的想法。他一廂情願的，把中國的監察制度抽出，成立一個監察院；抽走國會的監察權，立法院沒有監察權，監察

權裡又沒有審察預算權，無法有效執行懲戒，監察委員就變成了特務，或是像地下檢查官，他只能糾查你，而不能懲罰你。所以當立委和監委分開時，整個國會的立場就站不住，行不通了，監察權整個完蛋啦！簡單說，這個基本設計錯誤了。閉門造車是沒用的，因想像和實際差太多了。

回頭來看文化問題，我們學外國，是全盤的，好壞全來，沒有可選擇的，這不是買菜，不能說我只要好的，不要壞的。有人也許說：「這是你李敖的謬論！」其實不是。在清朝末年，上海震旦大學的校長李登輝——不是現在的那位李登輝，他創立一份環球中國學生報，裡面提倡一個理論，認為我們只有死心塌地、全盤去學習外國，而我們固有的國粹，等將來中國變成強國後再去學都不遲。舉一個人，本是一個教授，搖身一變，變成美國福特公司的董事長；又變，做了美國國防部部長；再變，變成國際銀行總裁。他是誰？就是詹森總統時代的麥納馬拉。他是如此強，在哪行都是第一、最優秀的，試問：他有沒有唸過四書五經？沒有！唐詩三百首？沒有！他一個中國字也不認識，一本中國書也沒看過——包括翻譯的，但他有世界一流的頭腦。眼前看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，她會中文嗎？美國剛卸任的總統雷根，他念中文嗎？他們不會，也不需要會，仍舊可以解決人間的問題。

同樣的，人家是強國，我們不需要搞花樣，什麼監察院、三民主義等，只要選對了

，死心塌地去學就夠了。當然他們有缺點，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要選錯了。如「五四」以後，我們的選擇就是錯誤。我們認定是民主，喊著民主的口號，就不該忽視英式和美式的民主；當時有些人不認可這些民主，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民主、少數人的民主、資本家的民主，他們說要無產階級的民主。但幾十年下來，學到了什麼？學到的「無產階級的民主」實際上連資本家的民主都沒了。

這觀念何時開始改變的？看胡適，他當年他說，二十世紀我們追求的是社會主義。這話沒錯，但到台灣後，他開始反悔了。他表示，我們追求的不當是社會主義，孫中山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——共產主義當然也是一種，而追求社會主義的結果，是政府愈來愈有錢、有權，而老百姓窮了、弱了，整個國家的力量集中在政府手中，直接控制到你的胃，你怕丟飯碗、沒飯吃，這時你什麼都不行了。就像海耶克（F.A. Hayek）提出的——『到奴役之路（The Road to Serfdom）』，走社會主義的結果，不能藏富於民，而在政府手上時，這政府會愈來愈有權有錢，老百姓將沒力量和政府抵抗。講個「笑話」，我李敖在台灣待了四十年，能混到今天，不被國民黨打倒，原因在於我能不靠他們吃飯，有自己的基本財力。前一陣子國民黨搞了一面大國旗，上了金氏紀錄；我李敖也有一項可上金氏紀錄的——我寫了一百多本書，有九十六本被查禁。從沒人能在被查禁九十六本書後，仍繼續寫個